

普通高等教育“九五”教育部重点教材

汉语方言学

李如龙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	何毓玲
封面设计	刘晓翔
责任绘图	朱 静
版式设计	史新薇
责任校对	马桂兰
责任印制	

内容提要

本书是教育部“九五”规划重点教材，全书分11章，论述了汉语方言的形成和发展、方言分区、语音系统和字音系统、词汇差异和词汇系统、语法差异，尤其注重了汉语方言的语音比较研究、词汇比较研究、语法的描写和比较研究、汉语方言与历史文化研究和汉语方言学的应用研究。本书立足于主要方言的比较，兼顾历时与共时、内部与外部，以理论总结为主，也注意了应用，反映了20世纪汉语方言学理论研究的前沿水平。本书适于高校汉语言专业本科生选修课和研究生专业课教学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语方言学/李如龙著.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普通高等教育“九五”教育部重点教材

ISBN 7 - 04 - 009563 - 7

. 汉... . 李... . 汉语方言 - 高等学校 - 教材
. H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810 号

汉语方言学

李如龙 著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后街 55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电 话 010 - 64054588

传 真 010 - 64014048

网 址 p:// www.hep.edu.cn

http:// www.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版 次 年 月第 版

印 张 13

印 次 年 月第 次印刷

字 数 300 000

定 价 11.5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序	丁邦新 1	四、汉语方言语音规律的探究	86
第一章 绪论	1	思考与练习	93
一、方言 方言差异 方言特征	1	参考文献	93
二、方言与共同语	5	第六章 汉语方言的词汇差异和词汇系统	95
三、汉语方言学的对象、内容和任务	7	一、汉语方言的词汇差异	95
四、汉语方言学的研究方法	9	二、汉语方言的词汇系统	102
五、汉语方言学的回顾和前瞻	12	思考与练习	107
思考与练习	15	参考文献	107
参考文献	15	第七章 汉语方言词汇比较研究	108
第二章 汉语方言的形成和发展	16	一、汉语方言词汇的共时比较	108
一、汉语方言的形成	16	二、汉语方言词汇的历时比较	115
二、汉语方言的扩展和流播	22	思考与练习	128
三、汉语方言的演变和发展	25	参考文献	128
思考与练习	28	第八章 汉语方言语法差异	130
参考文献	28	一、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回顾	130
第三章 汉语方言的分区	29	二、汉语方言语法的差异不容小看	131
一、汉语方言的分区是汉语方言学的重要课题	29	三、汉语方言语法差异的主要表现	132
二、关于汉语方言分区的原则	30	思考与练习	141
三、关于汉语方言分区的标准	35	参考文献	141
四、汉语方言分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40	第九章 汉语方言语法的描写和比较研究	142
思考与练习	44	一、方言语法的调查研究不容易	142
参考文献	45	二、方言语法的描写	143
第四章 汉语方言的语音系统和字音系统	46	三、方言语法的比较研究	147
一、汉语方言的语音系统	46	思考与练习	154
二、汉语方言的字音系统	59	参考文献	154
思考与练习	68	第十章 汉语方言与历史文化研究	155
参考文献	68	一、方言研究的新视角	155
第五章 汉语方言语音比较研究	70	二、方言与历史文化的关系的宏观研究	156
一、汉语方言语音的共时比较	70	三、方言与历史文化的关系的微观研究	161
二、汉语方言语音的类型分析	75	四、方言的文化类型分析	169
三、汉语方言语音的历时比较	81	五、双语双方言现象	174

思考与练习	178	三、为制定语文规划和语文政策服务	187
参考文献	178	四、为其他相关学科服务	190
第十一章 汉语方言学的应用研究	181	思考与练习	197
一、方言学必须加强应用研究	181	参考文献	197
二、为方言地区的语言教育服务	182	后记	199

序

大约是 1980 年左右，我在台湾大学开“汉语方言学”的课，主要的参考书是袁家骅的《汉语方言概要》，那时候我就想应该有一本《汉语方言学》的专著作为课本，这本书应该有什么内容呢？既用了“学”字，自然要有严密的系统，对于汉语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都应该作一个概况性的说明，在若干相关问题上也应该有深入的讨论。但是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来写这样一本书呢？这个人既要有丰富的田野调查经验，对各大方言有深入的了解，否则言之无物；又要有深厚的理论背景及对汉语史的认识，否则只能谈共时的现象，无法跟传统的学间接轨。这个人还要在做研究的同时，有兴趣写通论性的书。等了二十年，当李如龙先生把他的《汉语方言学》的书稿给我看的时候，我发现终于让我等到这样的一个人写这样的一本书！他要我写一篇序，这是给我莫大的荣誉，当然欣然同意。

汉语方言的差异古已有之，对于方言的研究可以推到汉代扬雄的《方言》。Paul Serruys 和严耕望分别研究《方言》的结果都是把汉代的方言分为六区。从汉代的六个区如何演变为今天各大方言的面貌，是很有意思但也不容易掌握的课题。这就牵涉到汉语方言的形成和发展（本书第二章），也要讨论语音、词汇、语法的历时比较研究，在本书中都有专节加以详尽的检讨。

我们常说在讨论普通语言学理论的时候，以往都以印欧语为主，很少引用汉语的材料。王士元先生在《语言变异和语言的关系》（见于《汉语研究在海外》）一文中，提出他的希望：“中国语言学将不只是吸收普通语言学的成果，还要为普通语言学作出重要的贡献，丰富普通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将有助于确定普通语言学的发展方向。”李先生的这本书无疑是向这个方向迈出了一大步。在“方言系统的整合”的一节里，他提到“叠置式、覆盖式、混合式、蜕变式”的不同，在“汉语方言的异读系统”中，他讨论了“文白异读、别义异读、音变异读”。在“方言与历史文化关系的微观研究”中，他指出“风物词语、习俗词语、观念词语”的特征。这都是汉语方言特殊的地方，值得研究普通语言学的人参考。我希望在这本书问世后能有人翻译成英文，使这本书的结论能够让讨论语言学理论的人引用。

近年来国内的语言学研究可以说是提升了一个层次，对一般性的理论有新的探讨和发明，先后出版了几本重要的理论性著作。对于研究方言学的人而言，现在李如龙先生这一本《汉语方言学》正好满足了这方面的需要。我以后如果再有机缘开方言学的课，就不愁没有课本可用了。

丁邦新谨序

2000 年 10 月 11 日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第一章 绪 论

一、方言 方言差异 方言特征

1. 方言

方言，俗称地方话，在中国传统中，历来指的是通行在一定地域的话。本书所讨论的汉语方言就是这个含义。

方言有大有小，所谓“一定的地域”，可以大到十几个省，小到一个村子。只要有明显的方言差异存在，民间就会有“××地方的××话”的通俗说法，学者经过研究则可以根据语言事实为一定的地域给定一个适当的名称，例如俗称“广东话”、“白话”，指的是通行于两广、港澳和许多海外华人中的话，学术界称为“粤方言”、“粤语”；广州话和香港话之间虽然十分接近，总是还有某些差异，因此还有“广府话”、“广州话”和“香港粤语”的不同说法。

50年代的方言学论著曾有“方言、次方言、土语、次土语”的说法，这大概是翻译欧洲人的说法（Dialect, Sub - Dialect, Patois, Sub - Patois）而来的。方言的分布范围有大小，使用的人口有多少，在社会生活中使用时势力有强有弱；然而就其素质而言，并无优劣高低之别，对于本地人来说，方言总是最习惯、最自然的交际工具。曾经有学者提过，“次方言”、“次土语”的说法容易造成“次等”、“低劣”的联想，并不是恰当名称。如果要区分地盘大小，多大的地域通行的才算方言，多小的算土语，也很难划定。可见，这些术语不但容易引起误解，而且难以定义。不论是“官话”、“白话”、“平话”、广州话、东莞话、香港新界的围头话，还是统称“方言”为好。

方言之间没有优劣之分，但是对于共同语来说，却有雅俗之别。地方话又称“土话”，不论是旧时说的“乡谈”、“俚语”，或者至今还在通行的“平话”、“白话”，都是着眼于它的“俗”。方言流通于“市井乡曲”，“平白如话”，一般只有口语形式，可以口头言谈而往往难以书写成文，因为那些通俗易懂而生动活泼的方言词语常常是“土得无字可写”的。在古代的传统中，方言土语和官方文牍、典雅诗文是判然有别的两种不同的文化层次。许多地方戏里，生、旦、净、末的唱腔和道白都是典雅的书面语，而男女丑角的插科打诨则是地道的方言口语，一雅一俗，相映成趣。

方言是自足的体系，在一定的地域，它可以是无往而不利的惟一交际工具。就这一点说，方言也就是语言。但是作为科学术语，语言通常指的是民族语言。现代的民族语言总是包含着民族共同语以及分布在不同地域的方言。就这一点说，语言大于方言，是方言的“上位”概念。方言是民族语言的组成部分，也是民族语言的地域变体。所谓“现代汉语”，指的是现代

汉民族的语言，应该包含着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和各种现代汉语方言。现代汉语方言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地域变体。有些教“现代汉语”课、研究“现代汉语”的人所理解的“现代汉语”是不包括汉语的方言的，这实在是一种很大的误解。朱德熙先生说：“研究现代汉语的人往往只研究普通话，不但不关心历史，把方言研究也看成隔行。画地为牢，不愿越雷池一步。这不管对本人说，还是对学术发展来说，都不是好事（《语言地理类型学·序》，1985）。

大概就是从“变体”（Variant）这一点引申开去，现代西方语言学所理解的方言（Dialect），包括着地域方言（Regional Dialect）和社会方言（Social Dialect）。所谓“社会方言”就是同一种语言或方言在不同人群中的各种变体，例如因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的不同而造成语言的变异，这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内容。

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虽说都是语言的“变体”，但是变异的形式不同，二者的性质也是有别的。第一，地域方言对当地来说是全民通用的语言；而社会方言只是在部分人之中使用，不具备“全民性”。第二，地域方言是一个自足的、完整的语言系统；而社会方言往往只有语音的、词汇的或某些表达方式上的差异，语言的基础成分是多种社会方言共有的。第三，地域方言的语言系统是经过长期的演变和整合而形成的，虽然经常有变异，但在一定的时代总有个稳定的系统；而社会方言则往往不甚稳定，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参杂着语用的需要。第四，研究地域方言和研究社会方言方法上有很大的不同。社会语言学研究同一语言集团之中不同群体的人在使用语言上的各种变异，这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但是，把这种“语言的社会变异”定名为“社会方言”看来并不合适，因为“方言”早已用来指称“语言的地域变体”了。

把这两种变体归成一类，不论是把社会语言学并入方言学或是说方言学归入社会语言学都是不合适的。有的西方学者还把方言学列入语言地理学。方言总是分布在一定的地域，研究方言要考察地理因素，有时也用地理学方法（如绘制方言地图），但是方言也可作为完整的语言体系来研究，可以研究它的历史。因此把方言学局限于语言地理学也是不合适的。

2 方言差异

所以有不同的方言，是因为存在着方言差异。汉语方言之间的差异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人们最容易感觉到的是语音和词汇。平时所说的“土腔”、“腔调”、“腔口”、“口腔”指的就是方音的差异。粤西各县断断续续地分布着客家话，那里的人称为“话”，又把较纯的客话称为“大”，杂有其他口音的称为“小”，这是因为客家话把“我”说成 ai，读音特别。在赣南、湘南，人们称客家话为“么个”（麻介）话，这是着眼于客家话把常用词——“什么”说成“么个”。经常听到这种说法：汉语方言之间差异最大的是语音，其次是词汇，语法上差异不大。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这种说法引起了许多人的怀疑。如果说，汉语方言的差异首先表现在语音，这是有道理的，人们接触中首先感觉到的是语音。至于词汇，如果是书面语，现代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用语，确实差异不大，但日常生活用语则差异甚大。至于语法，从近几年的研究材料看，汉语方言在语法方面的差异也是不小的，特别是最常用的虚词，各方言分歧很大。闽南话相当于普通话的介词“在”的有“垫、带、伫、嘞”等说法，“坐在地上”可以选用其中任何一个代替“在”，也可以“嘞”为必要成分叠用其中的两个、三个或四个：“伫嘞、带嘞、垫嘞、带伫嘞、垫伫嘞、垫带嘞、垫带伫嘞”（李如龙、张双庆主编，2000）。随着研究的深入，在方言语法方面一定还会发现更多奇特的现象。

方言差异总是不平衡的。从方言之间的差异说，有的方言区内部差异大，和共同语及其他方言的差异也大，如闽语、浙南吴语、湘南——粤北土话；有的方言内部差异不太大，对于共同语或其他方言则十分特别，如粤语、客家话；有的方言与共同语及别方言相比特点不是太多，内部却不甚一致，例如湘语和赣语。从语音、词汇、语法的差异说，客赣方言之间语音差异小，词汇差异大；赣语内部词汇差异较小，语音差异较大。就闽语的语音说，声母差别不大，各地大约都是十四五五个；而韵母则差异大，从30多个到80多个不等。就赣语的语音说，韵母和声调的差异小，声母的差异大。

汉语方言的差异不论大小，彼此之间都存在着对应关系，总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官话方言大多没有入声，但是古入声字有的派入多调，有的归入一两个调，彼此之间也有一定对应。“交关”是吴、闽、粤都有的方言词，所用语素和构词法相同，但意义则殊异：在吴语是副词“非常”的意思；在闽语，福州话意为办事周至，厦门话意为“光顾、交易”；在粤语则表示“厉害”。这是同中有异。在雷州半岛的闽粤语和海南岛的闽南话都有b、d两种紧喉音，其周边方言则读为b、d或p、t或m、n。就其音类说，都来自古帮、非、奉母和端、定、知、澄等母。“睡觉”，吴、粤语说“觉”（粤语因语音变读写为“觉”），闽语说“眠”、“”，其根词“”都是从“困”（苦闷切，“悴也”）引申而来的，这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也好，异中有同也好，都说明汉语方言都是从古代汉语传承、演变而来的，它们是同一民族语言的不同分支。

方言差异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亲属语言之间的语言差异也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那么方言差异和亲属语言的差异有没有不同呢？

一般来说，方言差异要比亲属语言的差异小，因为不同方言之间虽有变异，总是要受到共同语的制约，而且方言之间也总有交往，总会相互影响。而亲属语言之间则往往各有自己的演变模式和发展规律。然而，有的方言差异也可以很大，而亲属语言之间也可以差异较小，这里还牵涉到语言的认同问题。汉语方言之间尽管有很多差异，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十几亿人口都在同一个中华文化的传统和氛围中生活，几千年的历史是诸多民族共同书写的。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文化的认同感都很强。加上数千年统一的文字用同样的形式沟通着纷繁的方言，因此，各方言区的人都从未怀疑过自己所说的话是汉语的一支。迁徙、流寓于海外的华人，不论走得多么远，离开多久，都想要为自己所操的浓重的乡音寻本求源。相反的，某些有亲属关系的民族语言由于分手不久或接触频繁，彼此差异并不太大，但是由于分治为不同的国家，营造着不同的民族文化或使用着不同的文字，人们并没有把这些语言认同为统一的民族语言。我国的壮语和布依语，欧洲的许多小语种都属于这种情形。可见，辨别方言或亲属语言，区分方言差异和亲属语言的差异并不能以“差异”的大小为标准，而必须和历史文化的因素综合起来考虑。

对此，赵元任先生曾有过很生动的说法：“平常说方言，是同一族的语言，在地理上渐变出来的分支；分到什么样程度算是不同的语言，这个往往受政治上的分支的情形来分，与语言的本身不是一回事儿。比方从前罗马国用的拉丁语，到后来渐渐变，变到现在，有许多分支，一方面有了政府上的分歧，一方面有了文字上的分歧，因此我们觉得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这几个都是不同的语言了……可是要把这些语言，……比较看起来么，有些地方也类似中国的几种方言，有如北京话跟上海话、跟广东话、跟福建话差别这么多，……在中国，全

国方言都是同源的语言的分支，虽然有时候分歧很利害，我们认为是一个语言的不同方言”（赵元任，1980，100～101页）。

3 方言特征

方言差异是不同方言之间在语言结构和语言材料上的差异，了解方言、调查方言必须从这里入手。方言特征是拿方言差异作比较，为各种方言归纳出来的特点，这是研究方言的直接目标，也是研究方言的理论升华。可见，研究方言特征是方言学的重要内容。

方言是独立而完整的结构体系，所谓方言特征必须从整体的结构上去考察，必须是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多种特点（特征丛）的有机结合，各种特点之间应该是有主有次，有表有里，还应该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个别字音、个别音值和音类的特点，个别方言词、方言语法现象，只是方言差异的具体表现，而不是方言特征。正若要说明一个人的特征，不能停留于个别外貌特征、性格特点或思想、行为的列举，而必须是有关这个人的自然特征、品格特征和社会属性的多方面的分析和概括。

既然方言分布的地域有大有小，研究方言特征就必须区分不同的区域和层次，不同的方言点、方言片、方言区都应该有各自的方言特征。不仅如此，不同的方言区、方言片之间也会有共同的方言特征。方言是民族语的地域变体，考察方言特征首先必须弄清各种特征的地域分布。方言地理学就是研究方言特征的地理分布建立起来的学科。这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一再证明，方言特征的分布总是纷繁交错的，很难找到两条完全相同的“同言线”。可见，研究方言特征只能从实际情况出发，展现各种范围里的方言特征的分布。

弄清方言特征的分布之后，重要的是研究为什么会在那些地域形成那些特征，为方言特征的分布作出合理的解释。

在一定地域形成某些共同的方言特征，原因不外有三：或是类型相同，或是源流相关，或是地域相连。类型相同指的是同样的结构关系。例如n和l，发音部位相同，都是舌尖顶着前硬腭；发音方法有同有异：都是响音，但气流的通道不同。因而在演变过程中可分可混，如果混同，或读n、或读l或两可（自由变读），无非三种可能的类型。又如前面走/走前面、先走/走先、快走/走快，动词语序或前或后；双音词介绍/介绍、勉强/强勉、牵连/连牵、地道/道地，也有两种可能的组合等等。方言间的异同是结构方式和演变方向的类型选择的结果。源流相关指的是不同的方言由于历史上曾经同居一处或携手同行，因而形成了共同的特征。例如客赣两种方言，语音上有许多共同点：全浊声母今读送气清音，晓匣合口混入非组，山蟹一二等元音有别，梗摄白读音韵腹为a、宕江韵腹为ɤ等等。这显然是因为客家先民曾在现今的赣语地区停留过，客赣方言曾是源流相关的。浙南吴语的厝（房子）、箸（筷子）、卵（蛋）、配（下饭菜）、驮（拿）、（尘土扬）、滥（湿）等和闽东闽语的说法相同，也是因为古吴语曾是闽语的源流之一。由于地域相连，方言在共处交往之中常会发生相互的渗透，例如长江流域从成都、武汉、长沙到南昌、扬州、苏州都有i in n的变化，这是跨几个方言区的相互渗透而趋同的结果。广东境内的客家话和闽南话都管煤油叫“火水”，大衣说“褛”，雨伞说“遮”，衬衣说“恤衫”，显然都是受粤语影响的结果。

类型特征未必是连片的，也可以和地域特征相重叠。纵向的源流特征往往是连片的，这是辗转移民的结果；如果远途迁徙，也可以不连片。由于方言的播散也可能异地相同，横向的渗

透特征则总是地片相连的，而且常常发生在不同方言区的交界地带。

研究方言特征有多方面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首先，只有摸透各方言的特征才能为方言分区提供可靠的依据。目前关于汉语方言的分区还有一些分歧意见，原因就是对各区方言的特征研究得不够，尤其是不同方言的词汇特征和语法特征研究得更少。其次，研究因源流相关而形成的特征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各方言的渊源关系和亲疏关系，也可为汉语史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第三，研究渗透关系形成的方言特征则可以考察方言间的互动关系，探索其中的具体规律。第四，关于方言特征的研究成果还应该应用于各个不同地区的语言教育中去。历来的语言教育由于未能针对方言母语的特点而进行相应的训练，因而事倍功半，这是不争的事实。此外，方言特征的分布及其解说对于研究地方史、民族史、文化史也可以提供有益的启发。

二、方言与共同语

1. 共同语的产生和发展

远古时代的语言状况我们是无法具体了解的了。近代人类学家有些关于原始状态的部落社会的报道，都说那里的语言十分复杂，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方言。根据这些情况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推测：远古的部落社会里只有部落方言，而没有共同语。

不论是部落方言或最早的共同语，都是因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随着人类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增强，社会群体逐渐扩大，产生了部落联盟，有了阶级的分化，出现了国家。大约就在这时，逐渐形成了共同语。

对于没有文字和典籍的语言来说，只能拿现存的语言作比较，构拟出古时候的“共同语”。正如梅耶（A. Meillet）所说的，“比较方法只能得出相近的系统……，而不能得出一种真正的语言和它所包含的一切表达方式”（梅耶，1957，14页）。“构拟只能给我们一个不完备的，而且毫无疑问是极不完备的关于共同语的概念”（同上12页）。在汉语的历史上，由于早有文字的记载和丰富的典籍，我们对古代汉语的共同语可以有很具体明确的认识。汉语历史上最早的共同语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如果没有最简单的共同语，就不能设想“合纵”、“连横”的说客们如何在霸主和国君们之间周旋，就不能设想如何整理出《诗经》和《论语》。秦代统一六国文字又进一步推动了共同语的发展。到了东汉的扬雄作《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则说明了当时的“绝代语”“通语”已经有明确的界线和崇高的威信了。

殷周的近千年间，中华民族的活动中心是在河南一带，秦和西汉定都西安，东汉又迁往洛阳。先秦的“雅言”和东汉的“通语”看来都是以黄河下游的“中原”地区（当时称为“中国”，国之中也）的方言为基础的。陆法言《切韵》序评论了不正的方音包括“吴楚、燕赵、秦陇、梁益”，没有受到批评的中原音，这应该就是他们心目中的标准音，也就是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篇》中所说的“权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洛下”的百姓口音和迁往“金陵”的贵族口音）

先秦的经典、两汉的小学 and 隋唐的韵书，体现着汉民族共同语的文字、词汇、语音各方面的规范，标志着这一共同语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用这种书面共同语写成的浩如渊海的

典籍，创造了人类古代文化中少见的高峰。

物极必反，这套书面共同语拥有的典籍太多了，表达手段太丰富了，由于官方的倡导，权威也很盛，在方言口语悬殊的现实中发挥了重大的沟通、统一的作用，于是“文言”“诗韵”“六书”成了一整套坚固的体系。汉代的读经尊儒，唐代和清代的古文运动又不断加强了这种坚硬度。然而人民群众的口语总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的，在封建时代能运用书面语的只是少数人，“言文分家”愈来愈甚。分布最广的官话方言从六朝以后就逐渐与书面语分道扬镳了，经过隋唐五代的数百年变迁，形成了一种崭新的口语的共同语，这就是宋元白话和《中原音韵》所代表的近代汉语。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也就是在近代汉语的基础上形成的。

汉语共同语的产生和发展跟中华民族社会生活的历史演进是因果相应的。这个事实本身也充分体现着中华文化的特征。汉语共同语形成得早、发展水平高，这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化的生动体现。中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方言分歧，这也正需要有高度发展的书面共同语来作为沟通的凭借。从文言到白话的交替，则是从小农耕作和贵族文化走向商品生产和市民文化的需要所决定的。汉语共同语的历史是中华文化史的缩影。

2 共同语和方言的关系

汉语共同语和汉语方言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就其对立的一面说，共同语和方言首先表现在差异上。其差异不但有结构上的差异，而且有功能上的差异。结构上的差异就是上文所说的“方言差异”。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它们在功能上的差异。共同语的使用是全方位的，有口语、也有书面语，有日常生活语言、也有艺术加工语言、科学技术语言；方言则通常只用于日常口语，有些方言也有戏曲说唱加工过的艺术语言。这是方言与共同语功能差异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就方言与共同语的相互关系说，共同语对方言的影响以及方言对共同语的冲击，始终是一种深刻的对立。这种对立还将长期继续下去。不过，共同语对方言的影响，越是到了现代社会就越强烈。这是因为共同语通行领域和地域都是方言无法比拟的，而且还可以透过各种媒体从书面语和口语两方面与方言争夺使用范围，借助行政、政治的作用限制和取代方言的流通领域。诚然，方言对共同语也会有某种冲击作用，有些强势方言对共同语的推行还有一定的抵制和竞争。在书面语中，方言成分对共同语的规范也难免造成障碍和冲击，这也是方言与共同语相对立的表现。但是，到了现代社会，这种反弹作用是越来越有限了，既不能持久，也无法普遍。

方言和共同语统一的一面在汉语有很突出的表现。袁家骅先生说：“民族共同语……具有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内部一致，……是书面语和口头语统一的形式，也叫做文学语言，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内容是无限丰富的，对方言有无比的约束力，自身在一定意义上是超方言的。”（1983）这主要是指书面语方面。事实上，在中国还长期存在着双轨制和双语制。所谓双轨制是书面语用统一的共同语，口头语则用分歧的方言。不论是先秦的经典、唐宋的古文或宋元的白话，汉语的书面语都是相当统一、影响十分深广的。但各地的口语则历来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即使是现代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官话方言之间，按纯口语写下来的文字，一看便能辨认出不同的小区方言：江淮官话、西南官话、中原官话……。所谓双语制就是在方言地区同时兼通普通话，这一点，连最保守的粤语地区也正在悄悄地跟上来，应该说已是全国各方言区的共有现象了。总的看来，双轨制是古来如此，先前强烈、于今淡化，书面语和口头语逐

渐靠近了。双语制则是早期微弱，晚近强化，近代以来渐呈扩展趋势。

方言和共同语在语言结构上也是对立和统一的关系。方言成分进入共同语，造成规范系统的失衡，共同语的成分进入方言，造成方言的“不纯”，这是对立的表现；共同语吸收了某些方言成分，方言则更多地接受共同语的影响，这种相互的转化则是统一的表现。

以上所说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是一般的关系，整体的关系。对于具体个别的方言来说，不同的方言与共同语关系则是各不相同的。我们考察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不能停留于一般的共性的考察，更重要的是进行比较，考察不同方言与共同语的不同关系。有的方言与共同语差异大，受共同语影响小，乃至对共同语的普及采取一定的抵制；有的方言大量接收共同语的成分，放弃方言特殊成分，迅速向共同语集中；有的方言采取双语制与共同语并用共存。不同的方言与共同语的各种不同关系主要是社会历史、地理位置、经济文化交往等因素决定的。研究这方面的差异，必须联系语言外部的社会因素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

三、汉语方言学的对象、内容和任务

1. 汉语方言学的研究对象

在西方，早期也有些方言的研究，到了19世纪，方言的研究主要是使用了绘制方言地图的方法。方言学又称方言地理学，主要是记录方言特殊成分，对个别方言做局部或全面的描写，调查方言特征的分布，绘制方言地图，说明造成方言差异的原因和过程。换言之，并没有把方言作为完整的结构系统来研究（廖秋忠，1988）。在中国，对汉语方言的研究一开始就进行整体的调查研究。

按照中国的经验，汉语方言学是研究汉语方言的学科，一切汉语方言现象都应该在它的视野之内，都应该进行研究。现实存在的方言之中，个体的方言是研究对象，但相关的方言的群体也可以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把所有的现代方言作为一个整体，则是综合研究的对象。历史上存在过的方言也同样可作个体、群体和整体的研究。诚然，现实的方言是完整的存在，可以确切地研究它的结构系统，这是方言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而历史上的存在过的方言，则只能从传世的文献史料中钩沉其片断，或通过后来承传的方言的比较勾勒其轮廓，往往很难恢复完整的面貌，但是这些研究对于我们了解现今方言的来龙去脉是很有帮助的。

关于现代汉语方言的研究，以往多着重于单点的描写，其实更重要的还是群体的比较研究和整体的综合研究。任何个体的特征中都包含着个体独有的个性和群体共有的共性，只有经过群体的比较和整体的综合，我们对个体的了解才能区分个性与共性，才能臻于系统和周密。

2 汉语方言学的研究内容

汉语方言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应该有自身的静态描写，有动态的考察；有内部结构系统的研究，也有外部关系的研究；有理论的概括，也有应用的研究。其研究内容应该是十分广泛的。

方言的静态描写可以是单点的报告，关于语音、词汇和语法的系统及特点的说明，也可以是成片的包括若干方言点的语音、词汇、语法特点的比较分析，从而说明某一方言区片的特

征。方言的动态考察可以是现行的老辈和新辈之间差异的描写，也可以拿历史上的典籍、文献的方言材料与现今方言的实际情况作比较分析，说明古今方言的流变。静态描写和动态考察都是方言结构系统的研究，也就是罗列方言事实。为什么会形成这些方言差异，不同的方言走过了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在演变过程中如何受共同语或其他方言的影响，这就必须联系方言地区的历史、地理、人文材料来进行研究，寻求对方言事实的解释。如果说罗列事实是纯方言学的研究的话，解释事实则还必须要有外部语言学的材料作佐证。静态描写和动态考察，罗列事实和解释事实都是辩证的关系，应该二者兼顾，交替进行，相互为用，共进共荣的。罗列语言事实是研究工作的起点，是认识对象的开始，理解事实、解释事实是从语言事实的内在联系所引出来的结论，是研究工作的目标，也是检验所罗列的事实是否客观、科学的尺寸。关于这一点，李荣先生说过：“也许有人说，研究方言首先是分析记录当前的事实，方言之间的比较跟古今比较都是次要的。‘君知其一，未知其二’。分析记录某个方言，不能受其他方言或古音的干扰。……要是一种分析方法，既反映本方言的实际，又照顾到其他方言和历史，那就更好了。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李荣，1983）关于文白异读，他曾经有过精彩的说法：“概括地说，北京的文白异读，文言音往往是本地的，白话音往往是从外地借来的。其他方言区的文白异读，白话音是本地的，文言音往往是外来的。并且比较接近北京音。”（李荣，1982，115页）如果不经过纵横两面的比较，怎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呢？理解了语言事实的根本，对日后的调查研究自是受益无穷的。

关于方言的理论研究，也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就方言学自身，可以研究汉语方言的分类和分区，说明各方言之间的远近亲疏关系；研究诸方言结构系统的历史层次，说明各方言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联系其他学科进行综合研究，也有许多生动的内容。例如，与现代汉语共同语相联系，可研究整个现代汉语的共时特征；与古代汉语相联系可以论证古今语音、词汇和语法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与相关的汉藏系语言作比较研究，则可以考察方言在发展过程中反映的古代民族语言的“底层”以及汉语方言与相关民族语言的关系。关于从方言材料引出理论，王士元先生曾经多次强调过。他说：“数十年来进行实际调查研究的成果，使我们拥有了非常丰富的语言材料。……令人不解的是，对于这些丰富的资料该做些什么，怎样解释它们，以及怎样从这些资料中提炼出最重要的内部联系，在这方面做的工作还很少。在中国语言学的这个范围里，有一种严重的不平衡现象，这就是资料丰富而理论贫乏。……我们必须超越仅仅作为语言学理论消极的吸收者的角色，而应成为主动的贡献者。”（王士元，1995）

至于方言学的应用研究，也有多方面的内容。例如针对方言区的人学习标准语的难题，经过方言与共同语的比较，针对方言差异寻求最佳的教材、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这是很有意义的研究。又如调查方言地区人们的语言生活现状，经过比较为制定适用于各个地区的语言政策提供根据和论证。此外，透过方言的研究还可以解读各地的方言地名，解释各地的不同习俗，为研究地域文化和地方史提供许多有益的参证（李如龙，1994）。

3 汉语方言学的任务

汉语方言历史悠久，品种多样，差异纷繁。汉语方言学自身所必须完成的首要任务就是把现实的方言的分类、分区弄清楚。不但要弄清各区方言的特征，也要弄清各区方言之间的种种关系：源流关系、渗透关系、类型关系。方言的现状是历史演变的结果，要弄清方言的现状，

还必须了解方言的历史。不但要考察方言特征所反映的历史层次，为方言的历史寻求内证，而且要了解方言地区的移民史和行政区划属辖的变迁，乃至了解该地的经济文化的发展过程。从整体来看，汉语方言学还必须研究汉语方言从产生、发展到萎缩消亡的各个过程，考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方言和共同语的不同关系以及方言与共同语的互动变化，总结其中的规律。此外，透过历史和现状的变异的研究，方言学还应该窥测方言发展的前景，这项研究对制定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除了本学科的任务之外，汉语方言学还应该为许多相关的语言学科和人文学科服务。

现代汉语是由共同语和众多方言组成的。现代汉语的研究应该把现代方言包含在内。根据共同语总结出来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跟依据共同语和诸多方言所总结的规律，肯定有很大的差异。不仅如此，共同语不是还经常吸收着各种方言成分吗？有方言学者的参与，现代汉语的研究一定能得到重大的进展。

汉语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大多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方言中保存了大量古汉语的成分。“礼失而求诸野”，这些方言材料对于古代汉语、汉语史的研究是极端重要的。无论是语音史、词汇史和语法史都必须把古代文献的材料和现实的方言材料结合起来相互论证，才能得到接近科学的认识。此外，方言地区还流行着不少俗字、简字，对于研究汉字的发展史，这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汉藏系语言的比较研究不但应该有古代或现代的共同语的参与，也应该有古代和现代的方言的参与。在汉藏系语言的比较中。汉语方言和共同语的材料具有同等的价值。有些方言与其他汉藏系语言的交流比共同语还多。对于汉语语言学——以汉语为例研究语言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来说也是一样，历代共同语和历代的方言材料具有同等的价值。无视汉语方言的事实，汉语语言学的理论总是偏颇的。

在语言学以外，汉语方言的研究还可以为地域文化的研究、地方文艺的研究、地名的研究、地方习俗的研究提供重大的帮助。因为方言正是地域文化的载体，地方文艺的形式；绝大多数旧地名都是用方言称说的，所有的习俗都必须借助方言才能有明确的概念，才能具备可操作性，才能得到传承，这都是很明白的道理。

方言学的应用研究使方言学能够直接为社会生活服务，这也是方言学所担负的重要任务。上文已经提过，下文还将有评述，此处不再多说。

四、汉语方言学的研究方法

1. 调查方法

方言研究必须从调查入手。严格地说，调查只是研究的准备，调查方法并不属于研究方法。但是调查如果没有体现研究的需要就做不好，研究者如不亲自动手作调查，也很难驾驭调查材料，因此把调查方法视为研究方法的初步也无不可。汉语方言学一开始就十分注重方言语料的实地调查，这是一个优良传统。数十年的方言调查积累了不少切合汉语实际的工作经验。例如使用国际音标记音，用五度标调法标记调值，用四声分阴阳的方法标记调类，用广韵音系（《

使用这些表格和工作方法已经调查了大量可用的资料。这是应该肯定的。然而，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现有的调查表格和记音方法已经有些不适应要求了。

关于字音调查表格，现行的《方言调查字表》为了照顾古音的音韵地位收了不少生僻字。这些字在许多方言中问不出音，勉强问出来也往往不可靠。对一般性调查来说，这就徒然增加了许多负担。然而对任何一种方言，该字表又是不够用的，总有些方言特有的音节调查不到，单是根据这个字表记音，整理出来的同音字表都会有遗漏的音节。看来，作为语音基础调查用的字表有1500~2000个字就够了。与此相关的是需要一个基本词汇调查表，多收口语中的日常生活常用的单音词，既可补充字表之不足，把方言音节收齐，也可了解方言基本词汇的面貌。现有的词汇和语法例句调查表格大多不切实用。在总结已有的词汇、语法调查经验的基础上，可以组织不同方言母语的专家合作，重编一套字音、连读音变和词汇、语法例句调查表。各个调查表的条目应该有多有少，采取“梯级”结构，以便适用于不同的深广度及时间条件的调查。看来这已经是一项十分必要而且十分紧迫的工作了。

关于记音的方法，也有必要进一步做到规格化。目前，宽严的掌握分寸不一，附加符号各异，各种音变（轻声、变调、小称、儿化、子化等）的标音体例不同。关于方言词的汉字标写更是五花八门，或同音字、或训读字、或俗字、或生僻的本字，各取所好。以致同样的词写为不同的字，或不同的词写为同样的字，给外行人或初学者带来许多不便。这种状态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

2 描写方法

已有的方言描写方法也是语音描写方法比较成熟。记完字音，整理出声、韵、调系统和同音字表，以及文白读对应条例、连读变调的规则，如有必要还整理方音和古音及标准音的对应关系，这一整套方法已为一般的方言调查工作者所掌握。描写的质量高低主要看两个方面，一是能否排除训读和误读，一是前后有没有矛盾。有的调查报告把训读音误认为白读音，因而文白对应就搞错了。有的声韵调系统、同音字表与词汇记音不相符，读到后面的词汇记音材料又冒出前面语音系统中所没有的新的音类或音韵组合。还有的为双音词标音时把变调误认为本调。这都还有待于进一步改进。

方言词汇的描写需要注意的有两点。一是词义的调查和说解往往不够细致，在罗列方言词和普通话词的对照表时就经不起推敲。问形容词应该注意问所能修饰的范围，问动词则要问与宾语的搭配。普通话的“高”在上海话就不止有“高”的说法，个子高就说“长”，在厦门话则说“悬、”。二是关于词汇系统的归纳和分析，至今所见到的叙述似乎还没有具备说服力的框架。说普通话的双音词在方言说成单音，说语素次序有异，词义广狭不同，××方言外来词多，古语词多等等，其实，这些内容并非在同一个平面上的系统特征。而且往往只有举例而没有统计数据。

方言语法的描写工作基础更差，这是由于方言语法调查还缺乏经验，在没有进行全面调查之前，只就某些特殊结构去叙述“方言语法特点”是十分危险的。有些此类特点提出来了并未经过周密的调查检验，这就难免说的不合事实。有人说，某方言的动词比普通话多样而生动，例如关于“打”就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其实，在普通话，在官话区又何尝没有多样生动的说法？有人说某方言动词后附的“生动形式”比普通话多样，其实普通话花样也很多，只是他不

知道罢了。

在方言的描写中，最值得强调的是应该密切注意方言语音、词汇、语法三者之间的关系。有些方言音节只见于有音无字的词里（包括叹词、拟声词、某些单音动词），在词汇未作全面调查之前要叙述声韵调组合关系，统计音节数，非出差错不可。大多数虚词、虚成分都是从实词变来的，有些语法成分在语句组合中发生了各种音变，以至和虚化前的音相去甚远，本源难辨，在未经深入研究之前，轻易地认定某个虚成分是什么字也十分危险。还有，这些富于音变的成分所变出来的音，或者是一般连读音变、小称音变、双音词合音变出来的音，在方言语音系统中应该给予什么样的地位？这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有许多人把这些音都排除在音系之外，恐怕是不妥的。

3 比较方法

方言是由各方面的方言差异整合而成的。所谓方言差异包含着该方言与共同语与其他方言以及与古代汉语的差异。研究方言，归根结底，一要研究方言差异，二要研究这些方言差异是如何整合成系统的，整合起来的方言差异也就是方言特征。研究方言差异也好，方言特征也好，都必须从比较入手。因此，可以说，方言的研究必自比较始。单点的方言描写实际上也要贯串比较的方法。从介绍声韵调系统开始，就少不了与共同语比较、与古音比较。区域方言的研究——群体的研究，方言研究综论——整体的研究就更是离不开比较了。

方言比较研究可以分为横向的共时比较和纵向的历时比较两类。共时的比较是现代方言与共同语比，甲方言与乙方言比。经过比较可以了解各方言的特征，各方言与共同语的相同点与相异点，以及各方言之间或方言与共同语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还可以看到不同的方言之间及方言与共同语之间的相互影响。历时的比较是现代方言与历代的汉语共同语或方言作比较。经过比较可以了解各种方言差异所反映的历史层次，从而了解方言形成的历史过程。属于历时的比较还有方言与其他民族语言的比较，经过这方面的比较则可以了解方言地区早期原住民的语言“底层”和其他民族语言的“借词”。

4 考证方法

为了研究方言特点，尤其是了解方言与古代语言的关系，方言研究少不了要查证古代文献。就语言学文献说，历代的韵书、字书、词书以及记录古代口语（包括共同语和方言）的典籍都是常常需要查证的。方言里一些古时的读音残留、古词的残留，不经过查证就不能为之确认和断代。方言地区的说唱戏曲脚本或民间故事、山歌保留着前代方言的材料，研究方言也应该十分关注这些典籍。此外，正史、野史、民间谱牒也是方言研究者常常需要查阅的，因为摸清方言地区历来人口的迁徙，对于理解方言现象的历史层次有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5 其他方法

为了展示方言差异的地理分布，绘制方言地图（包括语言条目图和方言分布图）是个重要的方法。方言地图和一般自然地理或人文地理地图有同有异，但是都要借助某些制作地图的方法，这是可以肯定的。

为了调查老派和新派之间的方言的变异，不同社会成员使用方言的情况或某些地区存在的